

中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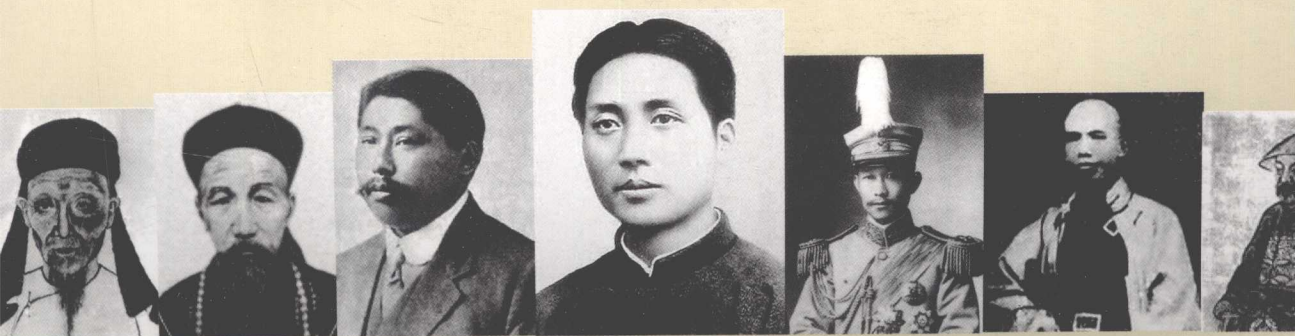
【下卷】

冲突交融中的 湖湘文化

——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抉择

ZHONGXI CHONGTU
JIAORONG ZHONG DE
HUXIANG WENHUA

彭大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 国家级重点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专业 重点资助项目
省级重点学科 中共党史专业

【下卷】



冲突交融中的 湖湘文化

——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抉择

ZHONGXI CHONGTU
JIAORONG ZHONG DE
HUXIANG WENHUA

彭大成◎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冲突交融中的湖湘文化 / 彭大成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438 - 6832 - 8

I. 中… II. 彭… III. 文化史 - 研究 - 湖南省

IV. K296.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246 号

中西冲突交融中的湖湘文化 (上、下卷)

彭大成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李建国 陈冰之

装 帧 设 计: 黄 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富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72

字 数: 1285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832 - 8

定 价: 138.00 元



下 卷

新文化运动篇

- 第十一章 学贯中西、“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0609)
- 一、反思学习西方的历史变革，提出国民思想的根本改造 …………… (0615)
- 二、热情介绍西方教育思想，全面推进中国教育事业 …………… (0657)
- 三、提倡圣贤豪杰之品德，培育经纶天下之英才 …………… (0688)
- 第十二章 新文化运动中的英猛斗士与西方新学说的**
- 积极引进者……………** (0717)
- 一、易白沙反孔号角的最初吹起 …………… (0718)
- 二、李石岑对西方新学说的积极引进 …………… (0737)
- 第十三章 “新民学会”一代新英的聚集与崛起 ……………** (0760)
- 一、湖南一师的创立与优秀的教育氛围 …………… (0760)
- 二、初露峥嵘的毛泽东与蔡和森 …………… (0768)
- 三、新民学会的建立及其宗旨 …………… (0775)
- 四、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0782)
- 第十四章 毛泽东掀起的洞庭洪波与“湖南自治”运动……………** (0796)

一、《湘江评论》掀起的洞庭洪波	(0796)
二、“驱张运动”与“湖南自治”的斗争洗礼	(0823)
第十五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0852)
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0852)
二、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先接受与热情宣传	(0861)
三、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烈追求与革命转变	(0875)
四、中国最早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李达	(0885)
五、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	(0916)
六、“留俄运动”与湖南第一批共产主义战士	(0938)

反思总结篇

第十六章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内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先进的湖湘文化	(0975)
一、关于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与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0975)
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船山思想	(0985)
第十七章 中西文化冲突中的思想先驱与实践闯将	(1021)
一、千古变局中的思想先驱魏源	(1022)
二、首次实践魏源思想的湘军集团	(1029)
三、首位走出国门的驻欧大使郭嵩焘	(1033)
第十八章 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抉择	(1044)
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历史新抉择的心路历程	(1044)
二、中国历史新抉择的民族思想文化土壤	(1058)
三、中国历史新抉择的外部原因	(1095)
附： 主要参考文献	(1123)
后 记	(1127)
编后语	(1134)



新文化运动篇



0609

【下卷】新文化运动篇

第十一章 学贯中西、“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第十一章

学贯中西、“欲栽大木柱长天” 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从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魏源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先后发起了“师其坚船利炮”与“机器制造”的洋务运动、“既乃师其政治制度”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特别是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起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但是，中国并没有真正改变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命运，甚至在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列强进逼、民不聊生的泥潭中陷得更深。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先进中国人的沉痛反思与认真总结，并从新的历史高度来探索中国继续前进的新道路。“发达旁，羊角益上，駉駉驶入无垠之哲界”的湖南人，又为此而进行新的求索。湖南近现代的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就是这样一位优秀代表。

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东乡板仓人。他出生于耕读之家，其“父书祥，乡里宿儒，以授徒为业”。杨昌济“入学即受庭训，未尝就外傅，凡经史义理辞章之学，皆书祥公所亲授。先生尤服膺朱子，慨然有济人利物之志。学成，未及冠，即受知学政张享嘉，补邑庠生，亦尝继父授徒于其乡。自署其斋曰‘达化斋’，每日必书日记，曰《达化斋日记》”^①。他18岁求学于岳麓书院期间，正值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兴起，谭嗣同创南学会于长沙，经常

① 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3页。



在会上发表鼓吹民权与改革的演说，杨昌济也经常去听讲。有一次他向谭嗣同请教何谓“天地之大德曰生”？“谭复生答云：‘于圣贤微言大义晦盲否塞之秋，独能发如此奇伟精深之问，此岂秦汉以下之学者胸中所能有哉？兹事体大，余亦何敢论断；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以民为主，乃余记此段之主旨。”^① 这是他于戊戌变法期间，最初从谭嗣同那里受到的“以民为主”而不是“以君为主”的启蒙思想教育。后来他在杨毓麟的家中，第一次读到谭嗣同的《仁学》，“当时觉得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②，充满了对谭嗣同的无限敬仰。杨昌济积极参加了南学会的改革活动，他所撰写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先振兴农工之学》一文，得到谭嗣同的高度赏识，以“南学会课取第三名”推荐在《湘报》发表，产生了较大反响。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后，杨昌济也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从此“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之业，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而又极感所学之不足，不足为人师，尝思往国外留学求知于世界，采取东西哲学家言，以教育青年，使之尽力于国事。适值一九〇二年，湘政府招考资送日本留学生，先生欣然应试，得取录往东京学习师范科。同往者有胡元倬、陈润霖诸人，大抵皆习速成科，期竟业早归办学，而先生与杨树达则愿习永久科，以富其所学而无误青年为主旨。先生居东三年，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更入日本帝国大学文科二年毕业，犹以为未足，远游欧西，至苏格兰亚伯淀大学肄业两年有半，得文学士学位，复赴德法考察数月始乘轮西归”^③。与杨昌济同往日本留学的是湖南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胡元倬、陈润霖等人，这说明杨昌济与在日本留学的革命志士是深有交往的。这从杨昌济能在黄兴、蔡锷、杨毓麟等人创办的《游学译编》上公开发表他的《达化斋日记》的部分内容，也可以看出他同湖南留日革命志士关系非同一般。而著名革命志士杨毓麟既是杨昌济的族孙，又是杨昌济在长沙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的同学，后来又同在英国留学。杨昌济与杨毓麟、章士钊“三人同处一地，交相淬厉者亘三、四年”^④。可见，杨昌济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英国，都始终同湖南的一批杰出革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思想感情是与时代的

①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②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③ 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④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8页。

脉搏一起跳动的。在英国时，杨昌济曾赠诗杨毓麟，回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诗云：

城南携手日，岳麓纵谈时。

山水足清兴，苍茫寄远思。

风云惊变幻，身世剧推移。

五夜闻鸡起，千秋信所期。^①

杨毓麟于1911年8月因悲愤国事于英国利物浦蹈海牺牲之后，杨昌济满怀深情地写了《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对杨毓麟的道德学问、壮烈事迹给予了极高评价与深切怀念。文中指出：“甲午中日构兵，君（杨毓麟——引者）时在校经书院，作《江防海防策》，痛诋当局。院长杜仲丹惊赏之，谓其退然如不胜衣，乃能为景略雄谈也……值日俄战争将起，君作《满洲问题》登之《游学译编》，声政府之罪，慷慨淋漓，声泪俱下。君见国势日危，欲奔走呼号以救之，不复能安心求学，遂归国往来北京、上海之间，无所就。曾从考察宪政大臣出游，于法政知识所得甚多，然以现政府欲徒饰耳目，非有真立宪之精神，不屑屑也。复在神州报馆为总撰述，每著一论，精神迸露，义气凜然，读者深为感发。君固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盖并世所罕觐也。”^②这说明，杨昌济虽抱定教育救国的宗旨，长期潜心研读东西方各国的学问，但他的政治思想与杨毓麟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对杨毓麟的革命活动是十分支持的。

杨昌济先后在日本留学6年多，在英国留学3年，又在德国柏林考察达半年多，在东西洋留学共达十年之久，是一位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海内大儒”。正如湖南著名学者李肖聃先生指出：“怀忠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书，十余年中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则友朋皆莫及也。今世道之不明也久矣，欲士之有志于为己之学，而不为逢时之术盖亦难矣。然亦视吾所自立者何如耳。怀中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身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③

杨昌济于1913年春回到湖南，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直至1918年夏，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

②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③ 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遗事》，《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79~380页。



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于192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享年49岁。

杨昌济在湖南虽然只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师，而且前后只教了五年的书，然而却对湖南的教育事业甚至中国现代的历史进步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杨昌济先生回湘之初，“适政府改岳麓高等学堂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聘先生为文科教授，先生欣然乐从，开始编辑讲义，翻译东西文伦理学、教育学名著。如《论语类钞》、《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史》诸书，皆在岳麓山讲学中所著述。湖南之师范教育，前清末年虽有中、西、南三路师范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之设，大辘椎轮，不为无功。但至高师成立，始有西洋伦理学、教育学及哲学等课程，其规划皆先生所首创。先生自精研中国经、史、性理诸学数十年之后，又继续在日英二国苦学九年之久，对于中西学术源流，政治风俗，了如指掌；加以本身之存养省察，事事物物，无不加以详密之分析，而后出之语言，发之为文章，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是以湖南之师范教育，至先生讲学高师时，乃与普通各科诸校有所区别。虽先生所采之英、德哲学诸书以作教材，多唯心派家言，然在湖南教育史中实别开一新纪元，不可忽视！”^①而这5年中，又正是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章甫、罗学瓚、张昆弟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风云人物在此向杨先生求学受教之时。杨昌济一生“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将青年们培育成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才，担当起天下的兴亡大事。他认为：“教育与政治有密接之关系，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无善良之政治，则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无善良之教育，则不能有善良之政治。”^②因此，杨昌济把献身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看作自己“神圣之天职”，并指出：

政治所以维持现在，教育所以预备将来。人情多役于现在，而忽于将来，此教育人才之所以少也。不知现在不预备，则将来亦但如现在，毫无进步。管子云：“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孟子曰：“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蓄，终身不得。”现在之人才可与图治乎，能应之者鲜矣。不能望之于现在之人才，乃欲望之于将

① 曹典球：《杨昌济先生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385页。

②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

来之俊彦，悠悠万事，无此为大，爱国者其知所从事矣。^①

所以，他为培养毛泽东、蔡和森等一代革命青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心血。由于杨先生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深得学生们的崇敬与爱戴。学生们对于他的课堂讲课不仅专心倾听，认真笔记，而且在课后还与他倾心交流，聆听教诲，经常三五结伴地去他的寓所求教，拿出自己的读书心得、笔记或日记请杨先生批阅。毛泽东等人放暑假时甚至步行上百里至东乡板仓杨寓拜访，同老师热烈而严肃地讨论人生哲学、时事政治、为人处世等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1915年7月《致友人信》中说：“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子升可谓能遵师训，且足以发者也。”^②可见毛泽东对杨昌济的敬仰之深。毛泽东后来还对斯诺回忆说：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③可见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人格影响之巨大。正是在杨昌济的指导下，毛泽东、蔡和森这群热血青年很快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经常围绕“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以及改造社会的“下手之处”等重大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这种讨论的结果，便导致了我国五四时期最早的青年进步社团“新民学会”的成立。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指出：新民学会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④在新民学会第一批21个基本会员中，除罗章龙一人外，其余20人都是杨昌济的学生。有人称杨昌济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⑤，确非夸大之词。杨昌济所教育与培养的“新民学会”这一批进步青年，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早期骨干甚至创始人，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袖。那时杨昌济立下的宏大志愿就是：“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而他所重点栽培并寄予极大希望的“大木”就是毛泽东与蔡和森。他曾对家人说：“毛、蔡将



0613

【下卷】新文化运动篇

第十一章 学贯中西、“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③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1~122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⑤ 王兴国：《杨昌济的生平及思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页。

来必然是中国的栋梁。”^①章士钊在其所撰的《杨怀中别传》中也提到杨昌济生前向其推荐毛、蔡二人之事。《传》中说：“时吾滞留上海，连得君（指杨昌济——引者）两函，一谓彼已订五十年读书计划，一为吾称述二人学行。二人者，毛泽东与蔡和森也。函称：‘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由是以知君以极庄严之理学，运之于极宏远之政治。”^②杨先生的爱女杨开慧，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跟随毛泽东一道参加革命，1930年被湖南军阀何键逮捕，当时何键提出只要她在报上公开发表一个与毛泽东离婚的声明，即可放她出狱，但她严词拒绝，坚贞不屈，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无限深情地填写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以表达他对爱妻杨开慧的深切怀念。其中有“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的名句，章士钊曾当面请教毛泽东：“何谓骄？”毛泽东答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章士钊对此感叹道：“嘻！此堂堂乎一字溢，媚赞欤？抑兼文教也？余何敢知。”^③可见杨昌济与毛泽东思想脉络与感情渊源之深厚！

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来看，杨昌济早在1914年就提出了改造“国民之根本思想”的号召，只是其影响局限于湖南一省，未能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那样身居中国之首都北京，通过《新青年》而登高一呼，立刻响遍全国而收山鸣谷应之效，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杨昌济却以自己的辛勤耕耘、埋头苦干，培育出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湖南新民学会的一大批热血青年，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无穷的后劲，为中国即将兴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输送了一支无比强大的生力军，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最壮丽的史剧！当然，这种巨大作用并不是在当时就可以看出来的，而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逐渐清楚地看到这种“百年树人”的教育之功。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杨昌济为中国即将开幕的历史史剧贡献了哪些新的思想素材与精神动力。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6页。

②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③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一、反思学习西方的历史变革，提出国民思想的根本改造

1913年春，出国留洋达10年之久的杨昌济终于回到了祖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湖南，这时中国已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清王朝已经变成了中华民国，可是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贫弱不堪，杨昌济深有感触地指出：“吾国改建共和已二载矣，政争汹汹，仅免破裂，人心风俗不见涤荡振刷焕然一新之气象，而转有道德腐败一落千丈之势。盖承积敝之余，纲纪一堕，势难免此。欲图根本之革新，必先救人心之陷溺。国民苟无道德，虽有良法，末由收效。处此时势，惟在少数之善良分子，协力与多数之腐败分子奋斗，积诚立行，以回易世俗之耳目而转移其风气，故政治而外，吾辈正大有事在。欲救国家之危亡，舍从事国民之教育，别无他法。此吾所敢断言者也。”^① 那时他就下定了以教育为终生事业的坚定决心。

杨昌济以他在东西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考察达十年之久的切身体会与渊博知识，深刻地反思、总结了自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历史过程，敏锐指出：“吾国输入西洋之文明，有其进步之次第焉。其始也以为吾宜师其铁船、巨炮，但取敌之而已，他非所宜用也；既乃学其制造，谓工业可以致富也。终乃师其政治、法律。吾则谓吾人不可不研究其精神之科学也。”^② 杨昌济高度概括地总结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即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魏源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发起的“求强御侮”的洋务运动，中国人首先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的表层结构——铁船、巨炮、机器制造等西方文明的物质外壳；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认识到光是学习西方文明的表层结构、物质外壳是不行的，还必须学习西方文明的中层结构——民主的政治与社会制度，于是在中国先后开展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但是，在辛亥革命取得表面胜利之后，中国人的思想灵魂仍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死的拖住活的”，旧的封建意识形态仍在发挥着巨大的历史惰性作用，顽强地把历史前进的车轮拖回到封建旧轨道中去。反动封建势力正在酝酿着复辟的丑剧。所以，杨昌济以独具慧眼的政治敏锐性，首次提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6页。

②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深层结构、核心内容的问题——“研究其精神之科学”，即其科学的哲学指导思想，也就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改造、整个国民思想的根本改造问题。他指出：

个人必有主义，国家必有时代精神。哲学者，社会进化之原动力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为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①

杨昌济的这一崭新见解发表于1914年10月，当时正值孙中山、黄兴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的复辟倒退势力气焰万丈之时。杨昌济清醒地看到，近1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从表面上看虽然“甚为急激”，由君主专制而改良变法，由改良变法而暴力革命，由暴力革命而实现民主共和，确如“海面波涛汹涌”，但“海中之水依然平静”，即广大“国民之根本思想”并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旧思想、旧礼教、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依然根深蒂固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封建专制的幽灵始终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正面临着封建专制复辟的巨大危险。杨昌济在这时明确地提出国民根本思想的改造问题，在当时可以说是独具卓见、空谷足音，比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同样见解早了一至两年。陈独秀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两篇文章，才最初提出“国民根本之进步”问题，发出了“吾人最后之觉悟”的战斗号召。陈独秀认为，要实现“国民根本之进步”，就必须彻底打破那种企望救世主从上面施给阳光雨露，如“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传统观念，大胆输入西方“自由平等独立”之学说，根本改造国民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唤醒全国人民“最后之觉悟”。他一语破的地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并大声疾呼道：“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恍惚迷离之境。吾敢断言：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00页。



0617

【下卷】新文化运动篇

第十一章 学贯中西、‘欲栽大木柱长天’的精神导师杨昌济

悟。”^①正是以《新青年》发表的这些充满激情的战斗檄文为标志，一场声势浩大、荡涤乾坤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兴起来了。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秀，早期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是胡适、李大钊以及鲁迅、吴虞、易白沙、钱玄同等人，而杨昌济在湖南长沙，以课堂作阵地，以笔、舌作武器，同样为中国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鼓呼呐喊，冲锋陷阵，以其渊博的学识、敏锐的思想、甚至一系列独创性的见解，给予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湖南进步青年以巨大的启迪与力量，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接踵而来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杨昌济 1913 年至 1918 年在湖南教书期间，也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酝酿、兴起之际，杨昌济主要提出了以下新颖精辟、深刻独到的见解。

（一）改造国民根本思想，提倡科学民主精神

杨昌济所提出的“国民之根本思想”的改造，首先就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他从欧洲回国之后深切地感到，中国虽换上了民主共和的招牌，但人们的思想深处仍保留着浓厚的封建意识与腐朽没落的旧思想。他在批阅学生的作文时发现，一些学生“多仍用君主时代之语”。杨昌济对此感叹道：“亦可见数千年积习深入人心，此等说法，摇笔即来，作者或不自觉其不合时宜也。”^②他还指出：“近闻人言，今日民国唯一我，除我别无他物。盖言今日唯有自私自利之可言，他可不必顾也。此诚代表社会心理之言，可哀可惧！人惟自私自利而无爱社会爱国家之心，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此种议论，生心害政，真有烈于洪水猛兽者。”^③杨昌济继承与发展了王船山、谭嗣同的民主启蒙思想，对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及一切封建的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猛烈批判。他指出：“王船山曰‘唯我为子故尽孝，唯我为臣故尽忠，忠孝非以奉君亲，而但自践其身心之则。’船山重个人之独立如此。吾国三纲之说，为谭浏阳所痛辟。余戊戌在岳麓书院闻湘潭王君言及此，当时亦颇疑之，后读其《仁学》，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君子之为教也，与父言慈，与子言孝。卑幼者自由之意志、独立之人格，尊长者固不可蔑视之。”^④这段话生动地记录了杨昌济接受民主新思潮的过程，即先从船山重个人人格之独立的思想开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8 页。

②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 页。

③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 页。

④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1 页。



始，认为道德实践应是个人内在的自觉，而不是某种外力的强迫，后来读到谭嗣同的《仁学》，才深刻认识到“中国三纲之说”，“实酿暴虐残忍之风”，因而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发生怀疑动摇，以至彻底决裂。他还说：“王船山论刑罚中有凌迟处死，太惨酷非人道，良然。船山又论张巡杀爱妾以享士之非，亦可谓能见其大。中国古制，君主以人殉葬……呜呼痛已！（近日东三省外人时有施灌油之刑于吾国人之事，惨不可言。）谭浏阳《仁学》，谓汉人女子缠足，满人女子不缠足，即此一端，可以入主中国而有余，其言绝痛。（近闻各县缠足之习复行。复古之流毒，一至于此）。又谓中国人重男轻女，驯至有溺女婴之恶习，以为中国虽亡而罪犹有余，盖弥痛不仁之流毒也。”^① 杨昌济从船山批判封建刑罚“太惨酷非人道”，联系到谭嗣同《仁学》对封建旧礼教、旧习俗的猛烈抨击，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既有看得见的杀人屠刀，更有杀人不见血的思想屠刀，对这种惨无人道的“三纲五常”，势在必革。后来毛泽东在《〈论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显然就受到杨昌济的影响。

杨昌济认为，要想从根本上铲除中国的封建专制思想与腐朽的封建意识形态，就必须大力提倡西方的民主与法治思想，特别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民约论》中所阐释的“天赋人权”与民主法治思想。杨昌济指出：“中国由君主专制而变为民主共和，民国之成立已八年于兹矣，而真知共和之意义者率鲜。卢梭《民约论》为法兰西大革命之原动力，上文所述，乃其对于法律之精言也。如云国家必有主权者，而此主权者即为人民自身。法律者，主权者意志之发表也。易言以明之，法律者，人民意志之发表也，无法律则不能有真自由。此皆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可不家喻户晓之大义也”^② 作为国民中的一分子，人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尊严、自由意志，这就是卢梭提出的“社会契约论”：“组成社会之各个人，同有权利，同从法则，既不侵害他人之权利，亦不使他人侵害自己之权利，故服从法律非屈服也。契约实各个人之保护者，不过变生来固有自然之自由，为法律上之自由而已。”^③ 法律又是由人民的共同意志制定的：“法律者，人民意志之发表也。”所以，一切人都必须遵守人民共同意志所制定的法律：“一切之人尊重法律，一切之人服从自身意志所发表之主权，则无主奴之别，无强弱

①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14~215页。

②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页。

③ 《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